



诉源治理取得新突破—— 一手抓末端一手抓前端 从“事后解”转向“事前防”



拱墅乐堤港“微法庭”



“法官工作室”介入指导诉前调解

【数说】

我省在2019年实现诉讼案件负增长基础上,2020年,全省法院新收案件同比下降7.2%,诉讼增量进一步得到遏制。

2020年县级矛调中心共接待群众134.9万人次,受理矛盾纠纷66.2万件,调处化解55.5万件,化解成功率94.9%。

截至目前,我省在线矛盾纠纷化解平台共进驻调解员4.6万名、调解机构5684个,在线成功调解82万余件。

2020年重大决策社会风险评估工作取得了实质性的突破和发展,全年共完成评估事项11390个,其中准予实施10525个,有条件予以实施797个,暂缓实施34个,不予实施22个,中止实施12个,凡是完成风险评估的事项没有发生一起不稳定事件。

本报记者 李洁

除了在法院处理各类诉讼案件外,每周五上午,桐乡市人民法院法官曹黎和她的许多同事一样,会去结对的基层司法所的“法官工作室”值半天班。

前不久,桐乡某公司一名员工在工作中触电死亡,其家属与单位就赔偿问题来到梧桐街道司法所申请调解。调解员将该情况告知梧桐街道“法官工作室”后,曹黎提前介入指导开展诉前调解,在街道政法委、司法所、派出所、律师代表等多元力量联合调处下,一个多星期后双方就赔偿问题达成一致。签订调解协议当天,法院还通过司法确认保障协议履行。

“像这样的案件,法院审理至少要3个月,现在10天左右就圆满解决,不仅节省了当事人诉讼时间和诉讼成本,也节约了诉讼资源,将矛盾化解在萌芽状态,定分止争效果显著。”曹黎说。得益于“法官驻镇联村、人民调解员驻庭”的双向派驻诉源治理机制,去年,桐乡法院诉前化解率达80.68%,上升36.17个百分点,居全省第一。

从2007年起,我省进入诉讼案件快速增长期,特别是2015年立案登记制实施当年,全省法院收案数达到134.4万件,同比上升16.1%。而政法专项编制数偏少,存在案多人少问题,政法系统超负荷工作成常态,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执法办案公信力。

对此,浙江从2019年起全面部署、创新推进诉讼源头治理,制订出台了《关于加强诉源治理工作的意见》,明确诉源治理由党政领导、政法主导、社会协同、多方参与、齐抓共管,并将其作为系统工程纳入社会治理、平安建设大格局,同时把治理领域从民事诉讼扩大到刑事、民事、行政三大诉讼领域。

“浙江的诉源治理不刻意追求案件数量的下降,更不是有案不立,而是强调利用非诉讼纠纷解决机制化解矛盾,将治理环节向前端和末端延伸,力争将矛盾化解在诉前、化解在源头。”省委政法委有关负责人表示。

县级社会矛盾纠纷调处化解中心的建设,无疑为我省诉源治理工作注入了强大的推动力。

“足不出户,公司拖欠我的工资就到账了。”近日,在义乌打工的庆元人吴大姐说,通过庆元县矛调中心的“云调解”服务,她向公司追回了自己的工资。

庆元县依托县级矛调中心建设,推出“线上+线下”相融合的“云调解”服务。通过现代通信技术,云上协商,在线形成化解方案,实现当事人一次都不用跑。而“云端”调解得以实现的背后,是一个强大的“线下”平台。目前,庆元县矛调中心整合行业性专业调解机构和社会力量,15家政府事权部门进驻,特别是诉讼服务中心整体入驻,与信访局等部



庆元县矛调中心

门共同构建一站式纠纷化解体系。去年,该中心受理的矛盾纠纷成功化解率达95.45%,一审民商事收案同比下降8.53%。

目前,全省已建立了99个县级矛调中心,通过线下完整的闭环式运行体制和线上大数据平台,矛盾纠纷多元共治联动效应日益显现。并且,以县级矛调中心为牵引,我省还健全完善了“一中心四平台一网格”的县域社会治理体系,“小事不出村、大事不出镇、矛盾不上交”已成为常态。

由于疫情原因,杭州的王女士与拱墅区远洋乐堤港(商业综合体)某培训机构产生合同纠纷,于是投诉至小河街道市场监管所。位于综合体内的乐堤港“微法庭”收到王女士通过“一码扫”小程序提交的调解申请后,立即联动市场监管局消费纠纷人民调解委员会、商业综合体消费者投诉中心,并远程连线法官,多方联动,快速调解了这起可调性纠纷。

2019年11月,杭州创新探索“微法庭”建设,“一根网线一块屏”,不增编、不建房,在村社、矛盾纠纷多发的园区、行业协会、商会等设置“微法庭”工作室,让法官在源头上参与社会治理,贯通司法服务“最后一公里”。

杭州“微法庭”正是我省构建完善“互联网+”调解体系的一个缩影。依托浙江移动微法庭、浙江ODR、庭审直播系统、智慧法院APP、浙江智慧检务APP等互联网手段,我省不断推进线上线下调解深度融合,努力为群众提供更多高效便捷的调解服务。

浙江的诉源治理,既坚持抓末端、治已病,更抓前端、治未病。通过建立健全社会矛盾源头预防体系,有效实现了从“事后解”向“事前防”转变。

老旧小区加装电梯是一项社会高度关注的民生工程。但由于同住一幢楼的住户对各自利益考虑的分歧,加装电梯很难达成共识,常常遭遇“一人反对”的困局。为了更加规范、高效地推进电梯加装工作,杭州市政府出台了《杭州市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管理办法》,明确老旧小区住宅加装电梯工作实行“民主协商、基层自治、高效便民、依法监管”的工作机制。

特别在《办法》出台前,杭州市严格落实风险评估机制,把问题和应对措施想在前面,前期开展了专项社会风险评估和大量的民意调查,从源头预防和减少了影响社会稳定的重大矛盾纠纷或隐患。截至2020年底,杭州已累计完成1800余处加梯项目,惠及住户约2.2万户,位居全国前列。

此外,浙江加快推进行政争议实质性化解,省、市、县三级行政争议调解中心实现全覆盖;完善“醉驾”案件办理工作机制、推进刑事案件繁简分流、规范刑事案件管辖政策等一系列富有浙江特色的诉源治理举措,推进诉源治理继续走在前列。